



中国人的生活系列

温州活路

温州30年变革的影像记录

萧云集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目录(CIP)数据

温州活路/萧云集摄. —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6

(中国人的生活)

ISBN 978-7-5452-0394-3

I.温… II.萧… III.①摄影集—中国—现代②温州市—摄影集 IV.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79001号

总 策 划 王 刚

执行策划 颜 文 斗

责任编辑 金 嵘

封面设计 胡 斌

版式设计 颜 英

技术编辑 李 荀

书 名 温州活路

著 者 萧云集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90X1240 1/20

印 张 10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394-3/J.219

定 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64855582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中国人的生活系列

温州活路

萧云集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温州30年变革的影像记录

目 录

序 平民视角里的温州变革/5

贫穷的田园牧歌/13

市场经济的先声/27

面向市场谋活路/43

温州人的坚韧/75

风云人物/95

时尚的变迁/127

消逝的风物/155

复活的民俗/181

平民视角里的温州变革

萧云集

处于浙江省版图西南角，人称浙江“西藏”的泰顺县是温州地区最偏远的山区。我从一岁到二十多岁都在那里生活。

我的父母亲都是师范毕业生，1961年是“支援山区”双双去的泰顺。在泰顺又是到最偏远的山区教书的我的父亲萧若驹因为才华出众被调到了文化馆，担任美术、摄影干部的工作。1966年到1976年，他整整当了十年的“摄影干部”，恰好记录了泰顺山区的文革十年，可惜的是文革结束时他烧掉了大部分的底片，而没有像李振盛一样把它们留下来。

我在少年时代对计划经济的记忆真可谓是刻骨铭心。我是家中长子，家常要买的豆腐基本上都叫我去排队，那真是一个痛苦的记忆。文化馆边上的大街叫“洋心街”，那里有一家豆腐店，主持工作的是一个叫“阿兰”的女人。“阿兰”权力很大，所有凭票排队买豆腐的顾客都由她一手安排，“阿兰”又是个很有交际的女人，用着一种很肉麻的声调叫她名字的人也很多，每每我看到很多排在我后面的人用这种声音叫着“阿兰”，总比我先切走木板上的豆腐。往往排到我的时候，“阿兰”总是笑着说：今天豆腐没有了，明天再来。

后来我索性跟着一些性急的顾客到位于溪边的豆腐工厂去，看着磨黄豆，看着一锅锅豆浆倒入布袋，再看着一笼笼的豆腐被关系户们“号”走，我对“关系”这个词语可谓“深恶痛绝”，不想今日这个词已经是“人脉”的另一种注解。

我经常到母亲那讨几分钱去洋心街口的摊位买那种切成一小块大棱角形的“九层糕”，有几个老婆婆专门在做这个生意，她们都用一种平底锅摊上猪油，再放上“九层糕”煎炸，很是香脆。但是有一些日子那几个老婆婆突然消失了，我去了好几天都买不到“九层糕”，后来才知道老婆婆们被“叫进去”了，参加一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学习班，因为县上认为，老太婆们卖“九层糕”，也是资本主义在泰顺泛滥的一种形式，是要坚决打掉的。

那时泰顺很多商店牙膏都买不到，机关干部们发明了用盐巴刷牙的“好办法”，用这种“方法”牙齿是洗干净了，但是牙龈很容易洗出血来，好在盐巴是有消毒作用的，电影里的战争年代我军伤病员经常为了搞盐巴而作出牺牲，我是不喜欢这样刷牙的。我和同学就想法步行到十几公里外的福建省寿宁县乡下的供销社去，在那里可以买到针头线脑之类的小东西，偶尔也能买到牙膏——这种上海已经很少生产了的生活用品。



1978年11月，浙江省乐清师范学校美术班学生合影。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全面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7月27日，在“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的大喜日子里”，我们77届高中毕业生就“乘着这强劲的东风，迎着灿烂的朝阳”，来到泰顺县大安公社洪岭头茶场，成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做了“准备在三大革命运动风口浪尖上锻炼成长”的一个茶农。

后来十一大在北京召开，泰顺三魁群众纷纷上街游行，“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高举着火把，个个欢欣鼓舞，火把像一条长长的火龙在游着，欢腾吧，快乐的人们；跳跃吧！伟大的人民！”

这是我日记中的一段记载。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有照相机，拍下几张照片就好了。

1977年底，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由于文革十年全国“积压”了太多的考生，第一次恢复高考时采用了极不合理的“两轮考试”，就是第一轮单考数学、语文两科，藉此来淘汰大量的考生。我的文科综合成绩很好，但是数学单科成绩很差，就算是语文考得再好也达不到两科平均总分的要求，自然就失去了这次机会。我们场上在农村劳动的二十名农友中竟然也没有一个人能通过这次残酷的筛选。但是文革后我国通过公平竞争得到高等教育的大门从此开启。

1978年7月，在我插队的辖区——泰顺县大安区三魁中学——带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参加“接受祖国的挑选”，考进了浙江省乐清师范学校音乐美术班，终于能成为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

乐清师范集中了当时最好的师资来教育、培养我们这些未来的教师。比较著名的有作家洪禹平（文革前的文化部专业作家）、名记者林白（后来调温州日报社任总编辑），美术老师则是著名剪纸艺术家张侯光、浙江美术学院毕业的郑岳华老师（现任浙江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但是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个教了一个学期不到就被激进的同学联名写信告到校方，很快就丢掉了饭碗的陈朱鹤老师。

陈朱鹤老师的形象是有点对不起那个时代的学生——整天穿着笔挺的西装，挺像电影里的日本翻译官，还非常讲究地在本来就非常干瘦的身躯上面所装载的同样干瘦的脑袋的头发上抹着发亮的油。最不可思议地是，他竟然还会有一个看着很淑女的，但是也很会打扮的漂亮的老婆。因此，他的讲课总是引起我班许多干部的敌视。更要命的是，他竟然在课堂上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十次路线斗争”中的第三次（左倾冒险机会主义）的重要的“反面人物”之一瞿秋白是“伟大的亲密战友”，他说，鲁迅先生给瞿秋白留下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文字。班干部都说，怎么会有这个可能？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陈朱鹤老师还说，刘少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很快就会平反。如此“反动”的话从这么一个与“汉奸”形象所差无几的老师嘴里说出来，怎么得了？班干部们紧急开会，到校长那里坚决要求撤换这个不负责任的“反动”的老师！



1975年，泰顺山区兴办轴承厂，
工人们边建厂房边开始生产。（萧若驹摄）

陈朱鹤老师课是没得上了，但奇怪的是，后来发生的一切都照他预言的那样实现了。

不知从何时起食堂里的那台2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每天晚上都在学生宿舍的操场上摆了出来，晚上看电视节目成了我们学生的节日。1980年初，李谷一唱的那首著名的《乡恋》我就是在那台彩电里看到的。学校里那段时间到处听到人们哼唱的声音。后来就有人说：“这首歌趣味不高，格调很低，是在气质、情趣、人物的品德和性格等方面都不够健康的靡靡之音”。但当时班级里已开始学习《青年圆舞曲》，学校也组织学音乐、美术的同学到温州欣赏上海歌舞团乐队演奏的贝多芬的名曲“解放”的俞丽拿亲自登台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西方绘画欣赏的课程也越来越多，学校外请浙江美术学院和社会上著名画家来讲课的也越来越多的。以前闻所未闻的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和“印象派”、“野兽派”绘画也映入了我们的眼帘。“我的看法当然印象派的这些作品好……”我的日记里记录了文艺思想改革开放的最初时期的波动。“就像我从喜欢西洋画转到了喜欢中国画一样，我对印象派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欢。我把西洋的写实派、印象派比作中国画的工笔和写意。”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在邻床的相处中，我们多次展开争论，各抒己见，常常脸红脖子粗，今天下午又展开……”同学们很自然地经常展开认真的讨论，大家都希望迅速地提高自己的水平，这也是“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全新的空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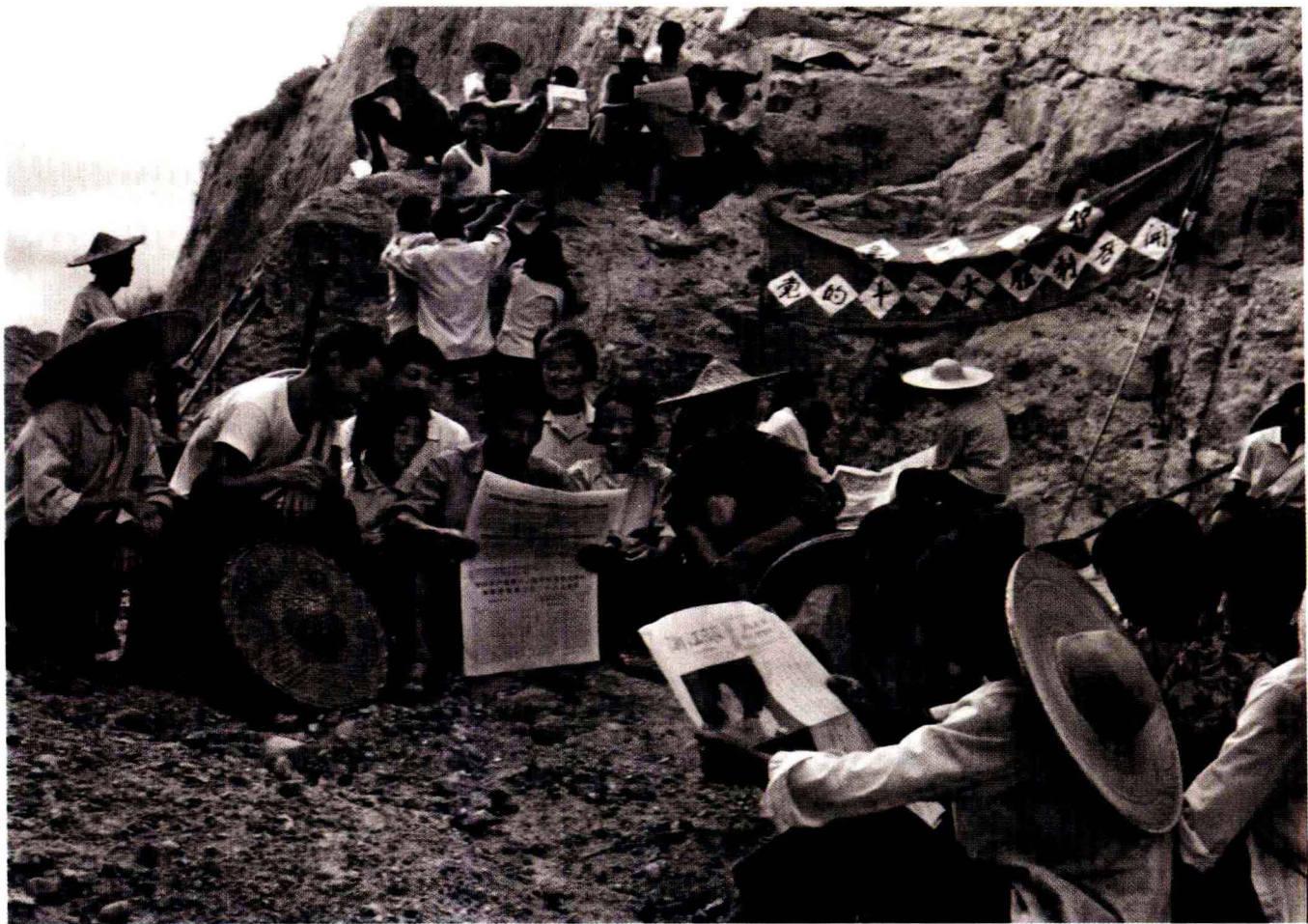
我从学校毕业是1980年的秋天。国家这时敞开了胸怀接纳世界，1981年11月上海举办了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画展，1982年4月北京举办了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博士带来的五百年藏画展，使我们第一次不用出国门就可以看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巨匠以及伦勃朗、鲁本斯、莫迪利阿尼等大师的原作。

中国美术馆几乎同时在办《日本版画展》、《香港著名摄影家钱万里摄影展》、《美术馆藏人物画、人物雕塑展》，民族文化宫举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表现主义油画展览》等等大型展览。这个时候，电视里正播放着反映日本柔道精神的电视剧《姿三四郎》。中国女篮正在和南朝鲜队进行着与以往的“友谊第一”有所不同的激烈的对抗赛。

1983年我到苍南工作的时候，电视还远没有像今天这么普及，县里电视差转台还刚着手建设，我作为一个摄影干部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县委书记胡万里是从温州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任上来到苍南工作的，他对我的关心，让我一生都不能忘怀。有一天单位里同事叫我说：县委胡书记找你！我还真纳闷：县委书记直接给我电话有什么事啊？书记在电话里说：昨天晚上县机关的同志们在河里参加兴修水利的劳动，那人山人海的场面啊，没有叫你去拍真是很可惜啊。又有一次胡书记对我说：小萧，昨天《浙江日报》头版你那张图片真不错！这么小的事书记都关心到啊，我真的很感动。

当我二十多年后，把我的摄影作品集《时代映像》送到老书记在杭州的家中时，他说：小萧真不容易，二十多年坚持在这条线上，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取得了那么好的成绩，真不容易！

这近三十年来，我真的从来不敢懈怠，温州是个“出新闻”的地方，也是个很有争议、发生了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喜讯到工地。（萧若驹 摄）

许多不可想象的人和事的一方“热土”。我对事物的看法和思维也不断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如何把握、表现温州的本质，这是一个课题，也是一个难题。许多摄影者因为太熟悉的缘故，大多对拍摄周围的东西不感兴趣。生活中的人如果能够以一种旁观者的心态来观察和认识生活那是很不容易的。为了拍好照片，我两次到温州媒体兼职，每天步行去上班，不断地在步行中体验、认识、抓拍，还经常会像一个傻子一样支着三脚架在五马街不息的人流中守候。在家里，人们常常会因为家庭的舒适和安逸而失去思想、行动的愿望，而住在温州，我每天考虑的除了摄影，还是摄影。作为摄影记者，拍温州人，再也没有比这更名正言顺的了。我把自己比作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随时保持一种新鲜劲，尽力去寻找我对温州的感觉，这种感觉有时真好，有时又实在难以找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那些刻意追求画面完美的照片不再吸引我，当年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随意性的记录，现在有许多东西却耐人寻味。因而，我力图在摄影中寻找一种新的东西，那就是许多特定的，往往会被忽视的却又能永恒的东西，这就是需要寻找的温州的本质！

我本不喜欢摄影，但是近三十年来却动用了摄影最基本的照相本性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并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今天看来，历史赋予了它们当中的某些特殊价值。一个人的一生只有一次，不可能重来，而一个人用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去领悟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及至真正有些感触的时候，却发现岁数已经不饶人了。

一个人的能力和认识水平总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谁也不敢说自己记录了这个时代的伟大变革，但是我们可以做些自己目力所及的记录，我的这本书就是这样的一些影像记录。

有些文字里没有表达的东西，请大家读图吧。

2008年9月于浙江苍南



1977年8月，浙江省泰顺县罗阳轴承厂的工人在听党的十一大公报。（重者胸 摄）

贫穷的田园牧歌

我的家乡平阳，原是我国人口第二大县（20世纪70年代150多万人，占温州地区三分之一），仅次于四川的万县。一向以“人多地少”著称。在与苍南分县以前我当然也被统称为“平阳人”。

“平阳人”当时很被我所在工作地方的泰顺人瞧不起。因为平阳的山地比较少，平原上没有大杉木头，于是青壮年就不辞辛苦去泰顺、文成一带山区购买杉木，然后一根根从大山里扛到平原来出售赚点差价度生活（这在当年就是投机倒把的行为），路上要花好几天的行程。久而久之，“背杉人”就成了一种职业，在泰顺人眼里，那个时期的“平阳人”就是“背杉人”，也就是不规中矩的“投机倒把分子”的别称。计划经济时代木材属于国家控制物资，国家为此设立了“森林工作站”，在各个交通要道都有“木材检查站”把守。“投机倒把”的“平阳人”就想方设法“绕”着走，因此那些偏僻的乡村古道，几乎都是“平阳人”足迹踏遍的角落。

1981年6月18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苍南县，从原平阳县析出，县治设灵溪镇。这次“兄弟”分家，从平阳析出来的这个位于东海之滨、紧邻福建省的苍南县分10区，977个行政村，面积1261平方公里，人口仍有103万之多。也就包括了“金乡”、“钱库”“宜山”这些有着好听的名字实际上出了许多到处去讨饭的“平阳人”的贫穷地方。

这还仅仅是“江南”平原地区，县城以南的“南港”地区基本是山区、半山区，农业发展缓慢，文化教育等基础设施非常落后，挺南、天井、信智等山区，贫穷的老百姓还有一件衣服一家几口人合穿的情形。



1984年，雪中放牧的泰顺山民。

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农村许多地方的农民仍旧像过去一样，终年被捆在一小块土地上，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农贫困生活。



1980年，坐在松果上晒太阳的泰顺山区儿童。